

闵冬潮

著

TRAVELING THEO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全球化与理论旅行

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全球化与理论旅行

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

闵冬潮 著

Traveling Theo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Transnational Feminism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与理论旅行: 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闵冬潮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201-06149-8

I. 全… II. 闵… III. 女权运动—研究 IV. D4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806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自 序:在全球/本土、空间/地域之间思考知识生产问题/1

1 “流动的空间”与“消失的地域”

——反思全球化过程中的空间与地域的想象/14

2 从全球女性主义到跨国女性主义

——兼论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28

3 理论旅行再出发/42

4 翻译的问题也是知识生产的问题吗/63

5 觉醒、启蒙、分离: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在中国的
理论旅行/83

6 在“两界之间”对话:翻译“feminism”的过程/106

7 一个旅行的概念:gender(社会性别)

——以北欧、东欧和南美对 gender 的翻译为例/137

8 跨国女权主义运动快照之一:gender 在中国的旅行片段/156

9 跨国女权主义运动快照之二:网络时代的“云南映象”/172

10 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关于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化的思考/201

附 录/215

后 记/234

自序：在全球/本土、空间/地域之间 思考知识生产问题

1999 年春天，我回国进行田野调查，为正在作的关于妇女研究及女性主义如何在中国本土化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当时的研究思路是，国外（＝西方）女性主义如何影响中国的妇女研究，它是如何被中国化或本土化的。中国和西方被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本土化是个关键词。现在来看，它明显地带有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思想痕迹。

在国内跑了 3 个月，我去了北京、天津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和与之毗邻的大城市，也到了云南昆明这样比较偏远的地方。在这期间，访谈了许多妇女研究的学者和活动家，参与观察了一些小型会议和活动。令我惊讶的是，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不同，我所访谈的这些妇女研究界人士，几乎全部有出国的经历，每人都有各种与国外的网络（感谢互联网的发展）联系，妇女研究的资源（经济的、组织的和理论的）也大部分来自国外。我突然感觉到，中国已经步入全球化的轨道，起码，妇女研究领域是这样。使我感受深刻的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地方与中心、地方与国外的格局。当我从北京坐了两两天两夜的火车到昆明之后，真觉得这个地方是那么遥远，但经过大量地接触当地研究者和 NGO 的活动家之后，发现那里有那么多的国际机构在支持着“无数的”（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

少)发展项目,此时我又觉得它离国际社会是那么“近”,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北京、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都近多了。这一远一近、中心与边缘的对比,预示了9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与80年代起步的初期阶段明显不同。这对我的研究也提出了个重要的问题:在国内妇女研究已经步入全球化的状况下,如果只关注“本土化”或“中国化”,是否还能说明问题?如果不能,那么全球化对中国妇女研究又意味着什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得先搞清楚如下的问题:在全球化已经在中国着陆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全球化?全球化是否只是代表着“全球”、“国际”这些“悬在天上”^①的概念?说到全球化,国内还有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全球一体化”。那么,全球是否是一体化?如果不是,或不完全,它又是什么?如何认识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化以及与其相关的概念“地方”、“地域”,它们与全球化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总之,全球化成了我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

1999年作完田野调查回到英国之后,我开始上网查找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当我点击globalisation(全球化)、global(全球的)时,立刻有上百万篇有关文章出现,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西方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一点也不过分。但论述local(地方)、localisation(地方化)则只有几十至多上百个文献。

这一多一少,不禁让人追问:作为与全球化相对的另一面的“地方”到哪里去了?

这种状况或许像鲍温图拉·得·苏撒·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所言“全球化的话语多少有点像是赢家讲述赢家的故事”(Santos, 1999: 216)。有赢家就有输家,谁是输家?莫不是那个被“全球”所遮蔽了的“地方”?显然,全球化的话语本身就存在着一种不平等和不平衡的关系。

^① 全球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流动”(flow),本身就有一种悬在天上的意味。

我们先来看看关于“赢家”(全球化)的讨论。毫无疑问,全球化与当前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资本的运作密不可分。绝大多数有关“全球化”的定义集中在经济方面,大部分都是说,从上个世纪(20世纪)最后20年来,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生产和服务及金融市场的全球性流动,如WTO、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等等。显然,全球化的概念首先运用于经济政治的运作和组织。其明显的标志是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运作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与威胁。可以说,这些“赢家”的故事构成了全球化话语的主旋律。

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在全球化的讨论中的不同声音,这种“另类”的声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草根组织,来自发达国家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学者。例如,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从20世纪70年代就对西方国家工业转型后对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对全球化理论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特别是地理学界对全球化理论的贡献最突出。这些知识与话语,不断拓展着关于全球和地方的视野,义不容辞地将“地方”、“妇女”、“贫困”等领域放在全球化之中讨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讨论不断打破全球/地方、中心/边缘的两分法认识结构,在认识论上为我们开启了另类思考的可能。尽管这些声音不是当前全球化话语的主旋律,但是它们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全球化的想象增添了另外的图景,另外一些话语和知识。可以说,这些研究为我们研究另类的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或者说,它要讲述的是全球化过程中“输家”的故事。

2004年,我回到国内工作。此时,中国步入全球化的步伐已大大加快。单从学术界来看,书店里充斥着大量关于全球化的书籍(尽管大部分是翻译的),网络、报纸、杂志上全球化的话语已成为老生常谈。其中,不乏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但也有不少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人云亦云的仿造,或者说讲述的是全球化中“赢家”的故事。例如,全球一体化的问题,许多人将全球化与全球一体化画了等

号,认为全球化有所谓客观性的趋势,有的人认为,全球化是全球一体化的基础,只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基础上,才会有全球一体化;而全球一体化则是在契约上和组织上把全球化固定下来,从而会大大推进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与全球一体化二者的区别在于:全球化是导致经济成为全球整体的“自然”发展过程,是客观的状态;而全球一体化则是由世界各国在契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人们(通过国家)主观意志的产物。所以,即使把这二者都视为一体化,为了加以区别,有的学者又把前者称为“非制度性”一体化,而把后者称为“制度性”一体化(李琮,1995)。

在这种全球化理论的影响之下,一方面是对全球化不加分析批判地热情拥抱,如我在上海大学所教的研究生课程讨论中,有同学把全球一体化与共产主义相联系;而在对全球化现象的分析上,又不假思索地将全球化过程中的金融、资本、媒体的跨国运作罗列出来,对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另外一些跨国运动却视而不见,或根本不将其视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如我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全球化过程中的跨国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进入我们的全球化视野之中。如果不是这样,下面的报道就会重写。2001年,在武汉大学举办的一个“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讨论会上,相关的报道是“来自英国桑德兰大学的吉尔斯教授就尝试性地利用‘全球化’的观点对亚洲妇女问题进行一番研究,而这曾经被认为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李文凯,2001)。殊不知,在国际上,妇女/性别研究领域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主要阵地之一。如此看来,这些现象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所谓主流学科的有些人是否也设立了另外一种“隔离区”,将自己的认识视野锁定在某个全球化理论范围之内,对其他的全球化理论与实践视而不见呢?

这种双重的“隔离”,像一面镜子,反射出在全球化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知识生产传播的不平衡与断裂,如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指出的:在西方学术界产生的关于全球化的知识,与一般民众对全球化的期待与疑问产生了隔离,与贫困国家的民众对全球化的疑问也产生隔离。他所担忧的是“知识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知识”之间正在增长的断裂(Appadurai, 2000)。那么如何面对、解决这种断裂,建立起一种民主的全球化研究,是阿帕杜莱讨论的关键问题。他的设想是,通过努力,逐步缩小“知识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知识”之间的距离,调解学术工作中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与断裂状况。因此,阿帕杜莱建议,关于全球化的研究,要把视野投向地区、国家、草根运动,要开展一种与“底层的全球化”合作的关系,让代表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的草根活动家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理论的层面上崭露头角。这样,新的关于全球化的想象才会出现。

在这个问题上,桑托斯可能更为激进,在2003年的世界社会论坛(WSF)上,他提出了另类的认识论问题。他认为,“没有全球认识论的公正,就不会有全球社会的公正”(Santos, 2004),明确地将认识论的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前提。桑托斯认为,我们关于全球化的知识基本上都是产自北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由科技知识为先导,靠贬低其他与其相匹敌的知识来拥有其霸权。这些知识被看做是无法与具有科学本质的市场规则的有效性和一致性相比的。这样,当面对其他知识时,具有霸权的全球化知识便把它们转为原始材料(例如,对本土的和农民的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知识),或以虚假和无效为由加以拒绝。桑托斯认为,世界社会论坛(WSF)的实践具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论(什么被认为是知识)和主体论(人类意味着什么)的预设。其一是认识论的多元化问题。这种多元化不仅意味着要看到存在着不同的运动,而且在每一运动中,都表现出多元的倾向。例如,女性主义运动不仅在政治上是多元的,而且对什么是知识也有不

同的认识。其二是主体论中的差异问题。这是关于在西方的科学知识与在其他实践理性和文化的知识关系中的确认、评价或等级化中的差异。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男性、女性之间是否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桑托斯认为，在我们关于全球化的知识中，并没有包括上述的这些东西(Santos, 2004)。

面对具有霸权的科学知识和霸权标准的真理，桑托斯提出“缺席的社会学”和“出现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bsences and sociology of emergences)的认识论，目的在于将那些实际存在的，而被霸权主义制造为“不存在”和缺席的知识再现出来，将不可能变为可能。(Santos, 2004)。如何将这种认识论中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实际上反映了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这种新的模式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要打破那种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身与心等二元对立的二分法，看到“客体是主体的延续”。二是，这种认识论必然要求认识的多元化，如地方性知识、女性主义提出的情景化知识等，这些知识纷纷改写着认识论的一元化模式。最后，这种包括地方性知识、情景化知识的知识生产的模式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因此，这种知识就不可能只是一种学术知识，还应包括社会运动、NGO组织的活动家们及与此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知识。这种认识论上的变化实际上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社会科学哲学中理论范式上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照这种知识生产模式的逻辑，回应前面桑托斯所提出的全球化话语像是赢家讲述赢家的故事，我们现在需要讲述的则是全球化中“输家的故事”。那么，如何讲述这些故事？本书将以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分析研究：

如何认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

在全球化的话语中，几乎所有讨论全球与地方之间关系的问题，都不能回避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衡。许多论述仍然把全球与地域看成是分开的两个东西：地域，总是被作为附属于全球的东西；全球，总是来自别处的“流动的空间”，代表着一种普遍性。用“流动的空间”（全球）遮蔽了不流动的地域（地方），这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叙事代表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利益。如何看到不同的“流动的空间”，看到“流动的空间”对不同的地域、不同群体的不同影响，进而看到地域的活动，看到社会里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更进一步看到它背后的权力关系，是我们反思全球化过程的关键。

本书第一章，将以分析“流动的空间”（全球化）与“消失的地域”（地方）这两种对全球化的想象入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连接，在这种反思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才会进一步看到全球化与妇女/性别的关联。

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认识，实际上就消解了某些全球化的普世性特征，使我们看到不同的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历史和地域的起源和特点。那么，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再谈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也就不是或不仅仅是国外女性主义如何影响中国的妇女研究，又如何被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问题。

跨国女性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反霸权主义的运动和理念，但在全球化知识生产不平衡、不平等的大格局中，跨国女性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新的霸权。那么，在这样一个既有从下到上又有从上到下的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对其进行分析呢？

全球女性主义还是跨国女性主义

如果说在全球化时代诸如“西方”、“中国”等以地域、国别为名的女性主义已经“过时”，那么，相应地冠以“全球”、“跨国”等名称的女性主义又表示了什么？如何界定跨国女性主义？全球女性主义是否等同于跨国女性主义？这是近年来女性主义争论的重要问题。由于全球女性主义的提法有着西方霸权主义的嫌疑，近来，越来越多的人采用跨国女性主义概念。

本书第二章从介绍全球女性主义的实践和理念开始，转入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跨国女性主义的分析，从而看到，在女性主义从地方“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必然带来女性主义跨国知识生产活动的迅速增长，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也变得日益“跨国化”。“理论旅行”司空见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时空地点被“翻译”成不同的意义，因此，取代那种对跨国女性主义实践视而不见、对女性主义全球关系理想化的态度，并进一步认识到，这种跨国女性主义基本上走的是从北到南、从西向东的“单向道”。但进一步来观察一下这个过程的细节，就会发现在各地区也出现了不同的“路径”。如何观察了解这些不同“路径”的理论旅行，便成为我们认识跨国女性主义知识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

理论如何得以旅行

“理论旅行”是赛义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发表的同名之作《理论旅行》中提出来的概念。他将“批评意识”引入了文学实践，强调创造性地借用、挪用理论，分析理论在国际环境中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运动过程。虽然赛义德所关注的是文学领域，但他这种开放性的

视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给我们的首先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启示。特别是“理论旅行”、“误读”与“批评”这几个关键概念。

本书第三章首先从阅读赛义德的作品开始，借助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对“理论旅行”的批评与发展，对“理论旅行”的理论进行梳理；进而，观察理论旅行中的“路线”、“场所”和“旅行者”等方面，了解某些国外的理论如何“到达”旅行的目的地。借对理论旅行的重新阅读，搭建如何认识全球化大背景下的知识生产中的基本框架。

不能忽视的是，在英语占统治地位的今天，理论旅行的载体是什么？即理论旅行所依赖的翻译的作用是什么？这是赛义德所忽视的一个方面。无疑，“理论旅行”的复杂性还来自于翻译的作用，因此，翻译的政治是我们今天讨论跨国知识生产问题时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环节。

翻译的政治如何“浮出水面”

本书第四章将从翻译入手来讨论知识生产的问题。

传统的翻译概念局限在“语言对语言”的范围内，翻译理论一般注重文学语言的翻译，讨论的中心是词语和意义，“忠实”（faithful）与“自由”（free）等问题。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随着解构主义的出现以及对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20 年代“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①一文的重新解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翻译研究领域开始重新思考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最鼓舞人心的进展是它与“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的结合（Lefevere and Bassnett, 1990）。对翻译研究来说，“文化转向”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也就是说，翻译将

^① 见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首先要考虑到文化,而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翻译研究中所争论的关键问题从“我们如何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变成了“翻译是做什么的,它们到底如何传播以及如何引起反应”。更为重要的是,翻译研究中因之而起的讨论,将翻译不再视为一个解码的过程,而是视为一种交流行为;同时还提出,翻译作为一种写作的实践,充满了由于穿梭于各种文化之中而引起的紧张关系(Simon, 1996; Snell-Hornby, 1990)。译者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隐身人”从幕后走向了前台。总之,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这些研究讨论中,翻译背后的权力关系逐渐浮出水面,翻译的历史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自此,翻译研究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学科,远远超出了语言翻译的范围,不仅进入了文化研究等学科,而且还成为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的新方法。

建立在这种对翻译的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我将进一步探讨如下问题: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某些跨国女性主义的概念、思想、知识是如何被翻译解释的?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语境中,哪些原有的意义消失了?哪些新的意义产生了?原因是什么?翻译者的身份如何影响了不同的翻译?等等。

本书重点关注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问题,显然,这里讲述的是一个全球化过程中“输家的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关注思考的一些相关问题有:女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是在何种形势下流向中国的?这些理论、概念是什么?是由何人提出的?它们从哪些人流动到哪些人那里?它们是如何流动的以及为什么流动?这些理论、概念对于中国妇女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的妇女研究学者、活动家是如何将这些理论本土化的?

如何讲述“输家的故事”

当然，对理论上的梳理分析不能代替对“日常经验”的认知，因为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我们才可能看到和提出“内在于我们现实与历史的真问题”，迫使理论思潮面对这些问题，使理论思潮和我们的历史、现实间发生一种深刻的扭结（贺照田，2006：6）。为了在这种扭结中，不至于使这些理论概念成为一次次时髦的话语，了无痕迹的过客，在本书后半部分，我将以跨国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旅行的若干案例来讲述这些“输家的故事”。

案例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第五章）

80 年代伊始，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的理论旅行到中国，开始“到达”那些为数不多的学术和政治生活的“开放”的空间。在学术界，这些理论首先影响了熟悉西方文学和历史等方面的学者，然后逐渐“旅行”到其他学科与妇联系统。在这一初始阶段，理论的旅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之间的联系，已有的知识准备，对英文出版物的获取渠道的掌握等等。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走向世界”几乎等同于“走向西方”，因此，这里我描绘出的女性主义“旅行”的路线，基本反映了在此情景之下，中国妇女研究界如何认识西方女性主义以及对其的接纳与抵触的走向。

案例之二：翻译“feminism”的过程（第六章）

“feminism”这一概念在中国经历了长期复杂的翻译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期间它在中国经历了出现、传播和取得合法地位的旅行过程。翻译“feminism”的概念就成为植根于不同语言文化中间的“译者”之间对话、协商的过程。我将探讨，处于强势支配地位的语言和文化如何被“本土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语诠释、重写、蜕

变、颠覆的过程。

为了探究这一段历史,我选择了三种出现在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重要“译者”作为调查的对象:一是北京的全国妇联,二是在中国大陆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和活动家,三是位于美国的海外中华妇女研究会(CSWS)。通过比较这三种“译者”在不同时空中的对“feminism”的态度及翻译,展现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知识是如何在中国被建立起来的过程。

案例之三:翻译“gender”的过程(第七、八章)

在这两章里,我将以 90 年代在国际妇女运动中流传最广的女性主义概念 gender(社会性别)为例,来看这一概念是如何在欧洲、南美和中国通过翻译进行“旅行”的。首先回顾 gender 理论的“发源地”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然后,展现在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gender 理论自身如何变成了一个不断重复书写的结构。

在此基础上,我将探讨 gender 概念是如何依其在文化语言上的强势,旅行遍及世界各地。其中,既有国际妇女运动的推动,如自 1975 年以来召开的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也有以欧美为主的各种国际 NGO 组织和基金会的支持和导向;当然,最终还要靠各国妇女自身的选择,尽管有时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从 gender 在欧洲、南美洲和中国的旅行来观察其翻译的过程,其所到之处,首先带来的是翻译的“烦恼”,对 gender 的界定,既要与本地语言里原有的相应词汇所区分,又要寻找新的词汇来翻译这个英语概念;既有在拉美妇女运动中旅途“顺利”的范例,也有在东欧、北欧旅行受阻的个案。通过对这一旅程的回顾,我们进一步看到,虽然它要随着英美 gender 理论的变化而变化,但在本地语境中的重新解释则因时因地而异,旅途之中处处刻下当地文化的“痕迹”。“当地居民”在误读中创新,于挪用中重写。其中,当地妇女运动的有无、强弱,妇女政治主体性的建立与否,是进一步运用跨国女权主义理论开展学术研究及

实践的关键。

案例之四：网络时代的“云南映象”（第九章）

据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网络社会时代。技术的发展是网络社会存在的关键，流动的内容则主要是资本、金融、贸易和信息（卡斯特，2006）。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网络——“流动的空间”似乎控制着地域（place）。然而，全球化还有没有替代的可能？各种地域是否还有可能组成另类的网络？知识生产在网络社会具有何种特征？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现实的调查和理论的探讨。在第九章里，我将选择云南成立最早的 NGO 组织之一——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YRHRA）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主要以我的 1999 年云南之旅为线索，通过与当地研究者和活动者们的访谈、在各种会议和培训班的参与观察、对各种出版物的分析等这些细节，来展现全球化过程中这种网络结构的特点以及网络中知识生产的过程和特点。

在最后一章里，我将讨论妇女研究的“学科化”问题。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国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生产的历史，也就是研究这一时期妇女研究学科发展的历史。通过回顾这一段历史，借鉴其他国家妇女研究学科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对处于发展“瓶颈”的妇女/性别研究学科的可能性提出几点看法：一是如何发展问题意识和概念意识，二是如何打破学术隔离区，三是从全球视野看学科化。

妇女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乘着思想解放的大潮而生。在这一学科近三十而立之年完成此书，其写作的意义也就在于：展现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学人的挣扎与努力，见证我们的困惑与遗憾，展望未来的希望与可能。